

# 建筑风采





# 关于图书馆扩建问题

杨廷宝（1921）

【编者注】这是旧图书馆扩建设计者杨廷宝先生给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一封信，在征得黄先生同意后，现将信中有关图书馆的部分，在这里转录照登。

黄延复同志：

年来经常出差，行止无定，致使接奉本年三月大札，迟迟未复，歉甚。

欣闻母校将举行七十周年大庆，谨再次随函寄上几句贺词，可能水平太差，如不合用，弃之可也。

下面答复几个问题：

1. 1919 年左右周贻春担任清华校长时期兴建了四大建筑 即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 均系美国建筑师事务所（Murphy and Denna Architect）设计 但当时的图书馆只是现在图书馆之西向的一翼。1930 年扩建时要求把新建部分作为主体，并要求新建阅览大厅南北向 因此 我就把正门放在东北角直上二层 使之壮观 而建筑细部及各种用料尽量和原有细部协调，以使全部建筑表现出一种完整统一的章法。

（以下略）

以上一点情况供您参考。此复顺致  
敬礼！

杨廷宝

1980.7.17

杨廷宝

1901—1982，河南南阳人，建筑学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25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科院院士。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完成100多项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设计。他主持设计的清华老图书馆扩建工程，被称为“扩建设计中一个罕见的范例”。

# 我爱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杨绛 1933 研）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学校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1932 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直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蹑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 70 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锺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馆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锺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指清华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学院合并为后来的清华大学——编者注)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惟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

笔名杨绛,1911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一同留学英、法国。1938年回国后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1949年7月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授“英国小说选”等课。1952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 清华大学图书馆

## ——自强不息的大熔炉

冯新德(1937)

我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一年级时想转学到有如诗如画未名湖的燕京大学，但结果是考上了清华插班生。一进清华大学发现有两个“清华园”：一是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里面尽是硃红漆走廊的工字厅，古色古香，皇家气派；另一个“清华园”叫做二校门，向里一望，一片大草坪，后面坐落一个西洋大建筑是大礼堂，走近一望，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的大铜门，仿佛置身天国。随后又发现体育馆的大铜门和大图书馆的大铜门，我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体育馆、健身房以及洋式大礼堂都见过，惟独没有注意过图书馆，因此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了我的新鲜事物，它的大铜门更是令我特别关注。

清华大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在二层，要先上大台阶走进大铜门，里面出现一个幽雅的世界。左手边便是大阅览室，又高又大，似乎望不到底，真有点像大礼拜堂，两边排着八人使用的大书桌，看来可容二百人，最引人瞩目的乃是桌上的四个绿灯罩和一片棕黄色的软木地板。这是全校同学都能进去的阅览室，既可以看到自己的笔记和课本，也可以借阅教授指定的参考书，所以一到华灯初上，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即便是挤满了人，还总是鸦雀无声，除了一些翻书声和新皮鞋走在软木地板上的吱吱声，不时有人入室来，在

进门处休息一下，大都是出来喝几口自来沙滤水的。

记得大阅览室门口是一个大柜台，可以了望里面，经常有一位管理员在值班，学生进去要走左边小门；但要出阅览室必须先将自己的书包和借到的图书及借书证放在柜台上，管理员就在你从旁边小门走出去的几秒钟内检查一下，也包括你的书包。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彼此都得到尊重，因此我记忆中未见造成任何纠纷。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多半上午有课，下午有实验，白天去大阅览室的机会不多。我记得二年级时高崇熙教授讲定量分析有指定的参考书，所以总在有课的前一晚与张龙翔（清华时的同班同学，后为北大校长，1999年去世）一起去，要准备高先生上课时对学生的发问。到三年级时，晚上去大阅览室，主要是与龙翔一起做黄子卿教授给的物理化学习题，习题实在多得一人难以做完，多半是三四个人分工。到了四年级要做毕业论文，各系有系图书室，包括专业的国内外新旧期刊，在化学馆的二层东头、系主任办公室隔壁，四年级学生、研究生、教员、教授白天晚上都能入内。

1937年六月中旬以后，虽然化学系仪器都已装箱南运，但研究生考试（八月一日）并未取消，因此我与龙翔白天晚上都在大阅览室备课。七七事变后人越来越少，到了七月二十几号，南下火车早已中断，考试仍无确讯，打听到有为胡适开的一列专车，我们三人（包括恽魁宏）设法挤上这辆末班车回到上海，但研究生还是没有考成。

六七十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时清华大图书馆，特别是大阅览室，它的模样、它的气魄、它的内涵让每一个清华学子总有一番无穷无尽的回味、怀念与感恩，这确是一座并非熊熊大火却是敞开心怀（两扇大铜门）的大熔炉，称得上是清华学子自强不息的大熔炉。

2000.7.15 于畅春园

## 冯新德

1915年生，江苏吴江人，高分子化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8年获美国诺脱丹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至今。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 怀念抗日战争时期的 西南联大图书馆

韩德馨(1942)

时光悠悠，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喜欢读书，也见过了不少学校的图书馆，但是我最怀念的是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环境中的一个平凡的图书馆。它没有宽宏高大的建筑、新式富丽的装潢，可是这个图书馆以它存有的图书，高效率地传播着科学技术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以及抗日战争的信息。它不仅给予了我们科学的知识，也有做人的道理，指导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使我们永远怀念。

记得芮沐教授说得好：“一个大学，一般是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奋发有为的学生，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丰富多彩的图书，缺一不可其为大学。而把三者联结起来，主要靠图书。”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个学校的缩影。

六十多年前，西南联大办学有自己的特色，先谈图书馆吧。

我于1938年入西南联大读地学系，1942年毕业，又继续做研究生和工作，直至1945年12月才离开学校。在这段学习的历程里，自学最好的场所是图书馆。

1938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和教学场所位于昆明大西门外，一座民族形式大楼，环境幽静。由于当时环境比较艰苦，学校教学要求又很严格，同学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争取参考书来阅读，并做笔记，以便把功课学得更好。有时候，一时借不到主要的参考书，往往

就依墙而立，来阅读相关的书籍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联大有书读，是很不容易的事，同学们能够理解，也很珍惜学习非常努力。



（西南联大早期图书馆和教学楼昆华农校故址）

在战火漫卷神州的年月，西南联大的图书馆与其他学校相比，藏书是比较丰富的。先前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将部分图书运到昆明使用，同时，图书馆也抓紧时间在后方的千方百计地购买图书，不断地扩充书库的内容。老师和同学们差不多都依靠图书馆的精神食粮，而负责图书馆的专家严文郁教授，也写信给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之先生及有关学校，争取支援图书。昆明的交通还算比较方便，获得了不少国外研究所和大学的书籍。同学们就依靠着图书

馆搞好学习和科研工作，所以，跑图书馆是每个学生的主要任务。每天在图书馆门前排队，等候图书馆开门。每当门一开，有时能够捷足先登，借到教授所指定阅读的参考书；当我坐下来细细阅读时，心情之愉快，难以言传。我由于听觉不好，所以在读书方面，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往往先争取阅读参考书，写好笔记，在听完老师讲课后，再找参考书，补充自己的笔记；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抢借到参考书的，有时就借阅其他有关的历史书籍，以开拓自己的眼界。记得在那时，曾看过邓之诚的《中国二千年史》，也看过钱穆的《国史大纲》还看过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胡适论学近著》、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一类历史书籍。图书馆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也是学生们热爱的场所，同学们常拥挤着抢借书籍。每天图书馆抢借书籍，成为大学里一个热点。为抢借书籍，有的同学甚至把鞋挤掉了，也有同学的手表被门挤坏，有时文具被挤掉在地上；由此可以看出，同学们争取在图书馆借阅书籍的热烈情况，但从来没有同学埋怨。虽然战时物质条件很差，但精神生活却是充实而丰富多彩的。

图书馆容纳不下很多学生，幸好在附近的文林街一带有不少小茶馆，这儿也是同学们常去读书的地方，泡上一壶茶，安静地看书，还可以借一角之地来做习题，写实验报告；有时也可以同几个好友高谈阔论，互相切磋，交换意见，因此茶馆也成了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累了，还可以玩桥牌或下两盘棋，休息一会儿。在茶馆里，可以看出，云南人厚道、正直淳朴，也很同情学生的境遇，不以为忤。还有近在咫尺的翠湖边的云南省图书馆，也成为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分号，那儿收藏了不少的古书，特别为我校文法学院的师生所喜爱。我也曾在那里借过像《徐霞客游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还有《万有文库》自然科学丛书之类的书籍。昆明天气是有名的四季如春，翠湖风景旖旎，湖堤上花草丛生，翠堤春晓，清幽宁静，令人心醉，是战争时期联大师生很好的休息场所。后来，西南

联大在大西门外建成了新校舍，紧靠着云南古城和莲花池，范围较大，图书馆是位于学校中部的最主要建筑，占了相当大的面积，可容纳 600 多人。图书馆的西面是一排排草顶泥墙的学生宿舍，而东面则是一排排整齐的铁皮顶的教室。能容纳 600 多人的图书馆在战时已经很大的了，但还是很拥挤，同学们仍争先恐后地来阅读书籍。记得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所读的外文参考书，主要是原版的，保存得很好，这些书大多是从北方运来的，在当时能看到很不容易；听说有一些还是教授自己的书，放在图书馆，供大家来阅读。记得物理系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学习热力学的参考书，主要是物理系叶企孙教授提供的，还有不少教授采用不同方式，把自己藏书借给同学使用。同学们谈到往事，都很怀念和感激。

学校的图书阅览，除学校的大图书馆，各院、系还有自己的图



新校舍大图书馆和部分教室

书室，而这些图书室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一般由年轻教师管理。据段学复教授回忆（见《学校建设的一件大事》）：“1938年下半年，在西南联大借用昆华农校主楼的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就以这些图书为基础，建立起联大三校的数学系图书室。大约一年光景，我是助教兼图书出纳。我与华罗庚教授在昆明合作写出的一篇群论论文，就用到了美国数学会会报 1901 年第 2 卷的一篇文章。1952 年院系调整时，从清华调入的少量法文、意文数学图书（现在仍在大图图书馆）就曾经往返于北京、昆明途中，千山万水，真是一部一册来之不易啊。”

在昆明拓东路，西南联大工学院也有图书馆，收藏有关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较多，也有部分文史书籍，后来还添有国外赠送的微缩胶卷，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像材料力学、理论计算方面的一些新观点和方法，都及时通过图书引进了，如欧洲把钢筋混凝土用竹筋代替，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材料等。还有不少工程技术材料，也都是通过图书馆了解到的。

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南区，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由物理系、数学系、生物系、化学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组成的理学院。院长办公室附设有外文期刊室，我曾一度在外文期刊室勤工俭学，当时理学院没有专设的教师休息室，因此，外文期刊室是教师们较宁静的休息场所，也是同学们查阅外文期刊的地方。就当时的环境来讲，西南联大藏有六七千册外文书籍，在战时的大学已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些书主要来自牛津、剑桥、哈佛各大学的捐赠。有通过西南联大的教授联系获得国外捐赠，也有国联和美国卡纳基等机构的捐赠。以后英国李约瑟教授曾来联大访问，赠送不少生物学方面的书刊，带来一些科学文献微缩胶卷。众多的书刊充实了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内容。由于工作关系，我和理学院的教授有较多的接触，也从工作中获知当时教授治学的勤奋精神。如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教授，作风严谨，平时工作十分认真，每次从乡下来到

学校办公室，都亲自整理来往文件，工作井井有条。他关心期刊室，有时来期刊室看看，问问情况。他很赞赏地学系通过增加学生野外工作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做法，幽默地说：“年轻人不要怕爬山的辛苦 多爬山会把身体锻炼好 也是很好的爬山运动嘛！”他有几个熟识的朋友，经常爬山，身体都很健康，以此来鼓励我们年轻人。吴先生作风民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善于分析和帮助解决问题。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干练的行政领导者 他与教师们接触 谈笑风生 上下关系融洽 工作效率高。这是联大教师工作的一个片段。

联大图书馆，据说是由梁思成和林徽因教授担任顾问，设计建成的 虽曾遭受日本飞机轰炸 几十个炸弹落在校园 图书馆、书库的一部分被炸毁，但总体来说，对学校没有什么影响，学校里仍然充满着勤奋学习、朝气蓬勃的气氛。图书馆仍然屹立于春城郊外 发挥着她的作用，每天馆内照样挤满了人。

西南联大在教育方面很重视对学生的素质培养，注意“通才教育”，充分发挥联大具有众多学有专长的一流专家教授的优势。首先是要求学生基础要扎实，只有真正地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深造，成为有用之才。基于这种教育观点，学校安排低年级学生的课，就由学有专长、学识深厚的专家、教授来担任。记得我们理学院一、二年级所开的基本课程有 朱自清、王力、闻一多、罗常培、沈从文等教授的国文 潘家洵、叶公超、柳无忌、钱锺书、莫泮芹、陈福田等教授的英文 冯至、杨业治、洪谦、陈诤等教授的德文 吴达元、闻家驊、陈定民等教授的法文 江泽涵、杨武之、郑之藩、曾远荣等教授的微积分 吴有训、赵忠尧、霍秉权、郑华炽等教授的普通物理；周培源教授的力学；高崇熙、邱宗岳等教授的分析化学；杨石先、钱思亮、孙承谔等教授的化学 陈桢、李继侗等教授的普通生物学 张席禔、谭锡畴、米士等教授的地质学 陈岱孙、肖蓬等教授的政治学；张奚若等教授的政治学；雷海宗教授的中国通史（稍晚由

吴晗教授担任)；陈省身教授的微分几何；姜立夫教授的高等微积分。由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除上课专心听讲外，必须阅读必要的参考书，所以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都挤满了同学，座无虚席，形成了学习的热潮。拿我们学习的国文来说，内容非常丰富，从古代的《诗经》、《论语》直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这些都由各教授轮流专门讲述，课后还需做作文。指导我们班作文的是朱自清教授和吴晓铃助教，他们对我们的作文修改得非常细致，并指出其优缺点，遇到有同学写得好的文章，朱自清教授都指出文章的优点，加以鼓励。他一直勉励我们多读书，如何去读书，这样才能不断的进步。教我这一班英文和德文的老师是潘家洵和冯至教授，他们除认真讲解课文外，也介绍阅读文学名著。通过讲解，使我们了解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我曾在这段学习期间浏览过《茵梦湖》、《海涅诗选》和《德文月刊》等一类书籍，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在大学里，我们除学习自己的专业课以外，还学习文科方面的课程，同时学校也要求文科的学生选学理科的课程，以此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打好基础。

图书馆给予了我们知识，提高了我们的学识水平，也扩大了学生们的知识领域，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学校和老师对学生要求都很严格，是不允许有违纪行为的。我当时年轻，初进大学时就犯过错，却是图书馆帮了我大忙。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教我们化学的同时有三位教授：杨石先、钱思亮和孙承谔，他们都是早期留美学习的化学专家，各有专长。我被分在杨石先先生的班上，他讲课清楚、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我喜欢他的课（复员后，杨先生是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南开大学理学院院长、校长）。当时听同学讲，另外几位先生的课讲得如何如何好，就去偷听其他先生的课，旷了几节课，回来继续听杨先生的课，几次考试成绩都不错，我也就心安理得。后来才知道，杨先生非常认真，对每个学生的迟到、缺席都非常清楚，学期终了，化学课没得到通过，这才恍然大悟。根据大学